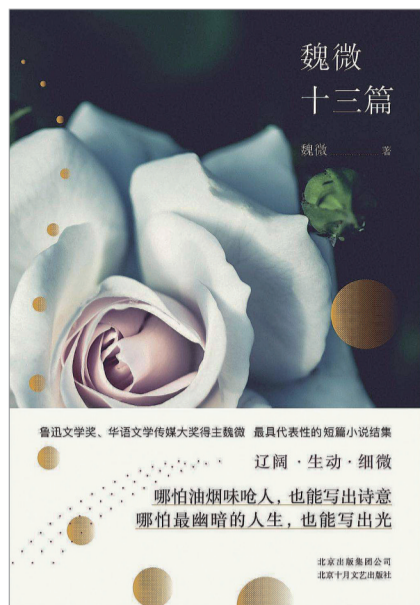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魏微十三篇》:

追逐人心的叙述

□唐诗人



《魏微十三篇》是魏微小说自选集,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是1996年,最后一篇是2011年。我跟着顺序读下来,恍惚是看一个人的回忆录,从过去慢慢回到现在,到末了是意犹未尽,带着展望;读完全上书的时候,我突然想象着,若一开始就从最后一篇读起,倒着读,感受是否不同?顺着读,是回忆和展望,倒着读,回忆会不会变成一种人心历史的追踪?若是,倒着读的感觉倒契合着魏微小说的独特魅力:一种追逐人心的叙述。魏微小说以写人心见长,还记得多年前读《化妆》时的感叹。魏微揣摩人心的叙述,细微到你不容忽视,只想一字不漏、一刻不停地把握住、跟踪上,这不是故事在吸引你,而是人心在诱惑你。作家巧妙地借用一个“小三”人物身份的自述式表达,将那种在欲望、爱情与自尊、理想等多种力量纠缠起来的矛盾内心描绘得细致入微,读来令人心潮起伏。在这个短篇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穷,还看到一个男人何以如此丑陋。在这个时代,男男女女都要化妆得比真实更美。作家拷问的是,你敢于不化妆吗?你敢于化妆得更丑吗?穷和丑,可以揭开男人最后的遮盖布,也扯下了现代都市社会的靓丽面纱。人心才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风景所在,遗憾的是,我们越发达,美好的人心离我们越远。以上算是多年前的阅读印象记忆,这次重读《化妆》时,联系着这篇小说的前前后后,我又突发奇想,《化妆》里女叙述者嘉丽十年前的真穷与十年后的装穷,魏微让她耿耿于怀十多年的内心生活,到底在追问什么?是忌恨一个男人的无耻与丑陋吗?而这个男人其实也是可悲、可怜,他的生命已被时间消磨殆尽;又或是反思现代城市文明的虚伪本质?这好像又太过直观太过简便了,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直视着、感受着现代都市妆容背后的真实面相。那么,我们对《化妆》的想象,是否可以抛开这些反映论的东西,只回到我们的内心?放下反映论的思维,用心去体验这种诡异的内心,如此,十年前的嘉丽,她犹豫的爱与潜

伏的恨,她出于穷的怯懦与出于自尊的自我发泄式的愤怒,哪一份感受不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穷时需要又害怕赤裸裸的钱,没有它我们觉得失望,有了它我们感受到羞辱;同样,我们爱时也是如此,需要钱的保障,又恐惧着钱的污染。穷与爱遭遇钱的时候,注定了矛盾纠结、脆弱不堪。十年后,变富的嘉丽化妆成穷人去见老情人,爱在还没有相见时已经落幕,她只是要表演,要检验这个老男人,连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看着这个老男人如何面对这个“又穷又丑”的嘉丽,就是在直面自己内心深处不可见人的羞耻感。读这个小说,我们爱嘉丽,也恨嘉丽,她痛苦,痛快,我们也感慨、自省和忿恨。其实,这种最原始的阅读感觉,最为纯粹,同时又能最为博大。小说追踪式地叙述出那些极其细微驳杂的内心经验,也就是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内在模样,它进入了我们的隐秘世界。有了这个内在的呈现,一切文学之外的道德判断或者社会文化意义,都不再需要刻意强调。很多时候,我们称小说家为讲故事的人,而称诗人为巫师,神秘而肃穆。其实,现代以来,这些走心的小说家,也如诗人一般,带着巫巫的神力,讲述的故事特别沉重,叙述很是绵密,却又能让我们完全投入。魏微的小说就是这种,故事平淡、日常,叙述却能游刃有余地追踪着人心,情感基调则是沉重、忧伤的。阅读这种小说,不仅仅是感同身受的问题,更是要你在不知不觉中,价值观就被改变。比如《石头的暑假》,写一个猥亵小女孩的少年,按惯常的逻辑来看,这是个不道德的故事。但是,作家用一种不可靠叙述者的方式,把故事变得情感复杂。魏微让叙述者“我”成为这个少年的好感者,开篇写“我”与这个少年隐隐的亲密关系,包括家长们对他的好孩子评价,这些前情铺垫,让我们对少年石头发生兴趣,有了良好印象,同时又暗暗地期待着将会发生点什么。果然,石头做出了猥亵小女孩的可怕事件,这震惊了所有人。可在“我”心里,却是好奇多于恐惧,是同情大于愤懑,甚至遗憾、不开心于石头对自己不再感兴趣。叙述者“我”的这份小女孩心思,多么天真、奇特,而我们也在这份天真的叙述口吻里,纳闷于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少年会这样。这份纯真的疑惑,延宕了我们对于事件的理解,携带到最后,小说写出多年以后,石头再次遇上那个女孩,忍不住又犯了事,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是命啊!其实,无需理解石头为什么会这样,只就小说的叙述视角,以及作家把一个并不少见的事件处理成一个诡异的心理事件,就足以影响我们了。起吗,我们不再会在一件孤立的事去简单地审判一个人,不会再高高在上地指点他人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而是深沉地想一想,石头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怜的,他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改变我们顽固偏执的道德感,趋向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更多理解、更多同情的有情人间。在这方面,《大老郑的女人》更为明显,大老郑的女人是本地农村妇女,来到县城打工,毫无技能,只能找大老郑这种来自外地的单身商人,结成临时夫妻,同时也像长工一样干家务活,领工资寄回农村家里,这种奇怪的婚外情,或者说一种变相的娼妓,进入文学故事,不是去考虑道德不道德,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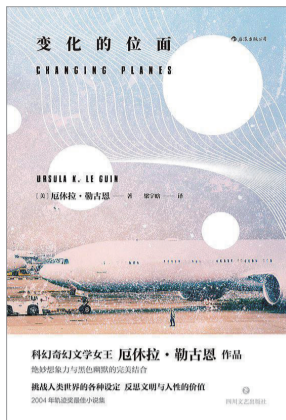
在勘入人心的孤独与慰藉,是对一种别样生活的同情与理解。小说叙述者直接表态说:“她们和娼妓相比,自然是有区别的,和一般妇女比呢,就有点说不清楚了。照我来看,唯一的区别在于,在通过恋爱或婚嫁改善境遇方面,她们是说在明处的,而普通妇女是做在暗处的。因此,她们是更爽快、坦白的一类人,值不值得尊敬是另一说了。”显然,这个理解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世俗道德评判。而小说中像“我”母亲那样的相对传统的人,也能对她们充满同情,不会去指责。魏微渗透在这个故事内的伦理考量,表现出了内在的超越性。完成这种超越,当然也是缘于作者真正关注的面向,并非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在感受着什么。写感受,追踪我们的心灵,叙述那些曾经令我们纠结不安的内心感觉,这是文学最迷人的所在。今天,在我们重新强调现实感和社会性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觉得,着眼于内心的写作,往往狭窄、逼仄,无法开阔,但我始终以为,真正做到了贴着人心写的作品,可以既接地气,深富现实感,同时又能飞翔、超越,表现出浓烈的诗性。《大老郑的女人》扎实地插入了90年代小县城的生活现实,而其表现出的人情,纯真到可敬。《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更为明显,以城市家庭的小孩视角,看着父辈的农村亲戚如何来访和怎么拘谨,写出叙述者那份厌恶和好奇混杂的矛盾心理,更通过细微的观察,把那些农村来的穷亲戚写得尤其真实。读这个小说,我仿佛看到了来自农村的我曾经如何造访城市亲戚,那份夹杂着美好想象的羞愧和不安,最为直接地展示着一份介于自卑与自尊之间的尴尬心理。这是扎实的一面,另外的是,魏微还在其中掺入了自己回归农村的爱情想象。这份不可能的情感,营造出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性想象,同时也消弭了叙述者曾经对农村对穷亲戚的厌恶之情。如此,这个小说不是乡土的也不是城市的,而是关于人心的。魏微用内在的心灵打通了乡村与城市、富裕与贫穷,由观察人心来观照社会现实,自是一种开阔。关注题材,不如关注人心,或者说,不管写什么,人心才是文学写作最值得耕耘的所在。在人的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故事,贴着人心的叙述,有其迷人的精致,也有其穿透人心的博大。“13篇”里,我们只谈及4篇,剩余9篇,也是关于人心的故事。20多年来,魏微着力于书写各个层面的人心遭遇,以多种方式完成着从内在感觉到外在现实、由个体心灵到群体精神的勾连与超越。

好书快读

主持:宋哈

《变化的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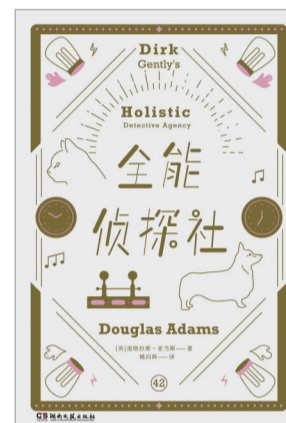
【美】厄休拉·勒古恩 著 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纽约时报》评价厄休拉·勒古恩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勒古恩不只在世界奇幻、科幻文学界有崇高的地位,更被重量级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列为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一。她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简洁优美的文笔丰富了整个奇幻科幻小说领域的内涵。《变化的位面》的叙事风格多变,小说里既有像博尔赫斯那样探究语言本质、寓意深远的故事,也有对埃舍尔错视风格的文学模仿。勒古恩以亦庄亦谐的笔调描写了一段精彩纷呈的位面旅程,并寄托了深远的寓意于这些故事当中,在在显示了她幻想小说大师级别的功力。

《全能侦探社》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浦睿文化 |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只死猫、一位电脑神童、一个相信世界是粉色的电僧、一个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学教授、诗人柯勒律治、量子力学和比萨,这些东西有什么共通之处吗?共通之处显然并不多。直到德克·简特利,一位自封的私家侦探,通过求解一场神秘的谋杀案,吃了很多比萨,发现一个鬼魂,拯救人类免于灭绝之后,所有的相关性才展现出来。

《纸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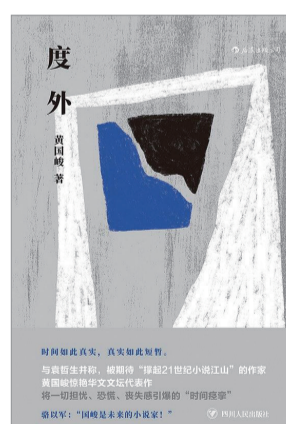
【日】角田光代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起轰动日本的银行公款挪用案件,嫌疑人是极为普通的41岁家庭主妇梅泽梨花。东窗事发后,梨花只身踏上逃亡之路,流浪于泰国清迈,而所有她身边的人,不可置信之余都在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实际遭遇与心理动机,会把一贯怀抱正义、平凡无奇的她推向这样的犯罪深渊。是欲望难填,还是自我迷失?众人的回忆与猜想渐渐拼凑成一个真实的梨花。

《度外》

黄国峻 著 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度外》是作家黄国峻的短篇小说集。在这本小说集中,黄国峻运用实验性的文字,探寻小说艺术的新可能,他以不同一般的纤细灵魂,将时间打碎、拼接,将丰富的意义寄寓在“度外”的语言之中,带给读者完全不同于往昔的阅读体验。在中文写作的无数尝试当中,黄国峻的小说“有一股不与时人弹调的庄严气派”(张大春语)。

写在《鲁国春秋》出版之际

□杨义堂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叫《春秋》,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至圣先师孔子亲自编撰的,是孔子最为看重、也最能代表孔子政治思想的一部书,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为了解释《春秋》,就有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春秋三传”,并且形成了经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春秋学”。《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足以让“乱臣贼子惧”,被称为“春秋笔法”。其中尊王攘夷、治国安邦的道理,已经被誉为万世成法。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凡是《春秋》学兴盛的时候,几乎都是国家强盛、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时期。我被孔子和儒家思想深深地吸引,编著了我的第一本儒学专著《祭孔大典》,2008年左右,看到一部写百年中药老字号的电视剧《大宅门》火遍荧屏,当时想请人写一部反映“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电视剧,但是找了几个全国一流的大编剧,都说孔府文化底蕴太深厚了,写不了。既然人家不写,那我就自己来写吧,36集的电视剧本写出来了,才知道影视剧是个名利场,无名的编剧是没有市场的,怎么办,图书出版相对容易一些,我就改成了长篇传记文学《大孔府》,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很好,这是第一部写孔府内宅生活的长

篇文学作品,特别是写出了1919年到1949年的末代孔府主人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久远的家族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走向灭亡和新生的故事。2013年,我来到济宁市文物局工作,那时候,全国正在推进大运河申遗工作,而济宁市恰好在大运河的中部,是明清河道总督官衙所在地,也是大运河地理位置的最高点,历代河道总督带领人民群众治理运河的故事可歌可泣,许多人被朝廷名列“名宦祠”,被老百姓祭祀为“河神”。我又写了为大运河做传的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在世界遗产专家来济宁考察时,赠送给那些专家,专家很受感动。这部作品获得了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并且被腾讯企鹅影视公司购买了版权,目前正在筹备拍摄同名电视剧。2016年,我在研究文物工作的时候,发现在山东德州有一处明朝时期南洋苏禄国国王的陵墓,苏禄国国王不远万里来中国朝拜的故事一下子打动了,我决定把这个故事作为下一部长篇小说的雏形。当时,我实地到山东德州苏禄王墓考察,查阅元代和明代的大量史料,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地理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北游记:苏禄王传》。《北游记:苏禄王传》出版的时候,正值菲律宾总统杜特



特来中国访问,两国元首会晤,习主席专门谈到了苏禄王来中国的故事。我的小说很受欢迎,德州还专门为《北游记:苏禄王传》举办了新书首发式。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文物局要在曲阜建设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需要布置一个展览,可是,鲁国历史上有36代国君,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国君的墓葬,地下发掘的东西太少了,不能办展。我就提出从《春秋》等历史典籍中找故事,把鲁国历史上栩栩如生的的人物和激荡人心的大事件展现出来,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于是,我又一头扎进了鲁国的历史研究,写出了《鲁国春秋》这部书。

一座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动物园

——读慢三的《尴尬时代》

□王辉城

美好与高贵业已沦丧,似乎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动物园。慢三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失落而疲惫的中青年。他们或从小地方走到大城市,或从事着不那么体面的工作。家庭、孩子、事业,每一样都像是一座座大山压在身上,每个人都负重行走。在《猴变》一文里,慢三以深沉而略带戏谑的笔触给我们讲了一个家庭悲剧。矛盾重重的母子关系、婆媳之间的暗战、异变成猴子的儿子、过分溺爱“猴子”而变得神经质的妻子,所有的悲剧元素都压在丈夫身上,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不堪忍受。丈夫为了妻子回归“正常”,决定铤而走险,毒死“猴子”。没有想到,最后却弄巧成拙,毒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我弄丢了自己的儿子,我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我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我犯下的罪三生三世也偿不完”,当丈夫要杀“猴”泄愤时,“猴子”却突然叫他“爸爸”,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是的,在慢三的小说里,生活很容易崩溃,或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外遇》一文中,两个青年时期的好友,面临着外遇

对象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尴尬。在《苏州谍影》中,慢三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极度不信任。青年毛飞年轻时曾以贩卖个人信息为生,故而产生了严重的迫害症与疑心病,最终妻离子散。小说的结尾极为讽刺,毛飞与身在韩国的房东见面,赫然发现他是一名中国人,并无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然而,毛飞并没有从疑心病里解脱出来,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日本人,“他开始怪叫着,没命似的跑了起来”。日常生活里的“谍影”仍然存在。毛飞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时代的通病,不如说是时代的恶毒。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固然方便了生活与提高效率,但同时我们亦无法保护自己的隐私。每个人都将成为数据与信息,被互联网企业贪得无厌地索求与贩卖。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进而成为生意。可我们能拒绝吗?答案是否定的。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尴尬。反讽是理解慢三小说的关键。他用戏谑的笔触,向我们呈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巨蟹男》是我极为喜欢的一

则短篇,曾是文艺青年的企业家,惨遭劫匪绑架。岂料,绑匪亦曾是一位文艺青年。于是,两位同好聊起文学、诗歌与星座。无疑,这是一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我们那代人几乎全跟文学较过劲儿”,企业家也好,劫匪也罢,作为理想而存在的文学,早就消散在风中。在小说的结尾,劫匪同伙们“将我的尸体大卸八块”。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面,似乎向我们宣告着文学中的崇高与诗意的消逝。在字里行间,慢三非常坦诚地透露自己参与过商业喜剧剧本的创作。尽管剧本最终没有投拍,但“这次写作无疑刺激了我”。他完成了自己小说观念的革新,剧本创作“讲究有规律的格式、有效率的方法以及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它要求我变得职业一点,放弃了那些随意的、小聪明的、自以为洒脱的写作练习”。进而,“故事虽然通俗,也有不可比拟的价值”。话虽如此,但这话却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我倒不是轻视或漠视故事的价值,而是小说一旦有了“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必然会丧失模糊性与可能性。因此,《尴尬时代》里的部分小说,情节过于规律、精巧和准确,让人稍觉遗憾。它们所呈现的世界,本可更为广阔,力量本可更为充沛。不管怎么说,我喜欢慢三的小说。它们快速而精准,戏谑而荒诞,具有新媒体时代写作应有的特色。他所呈现的困惑,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困境;所提出的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写作者)都应当去深思,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